

明初冕服礼制考论

A Study of the System Governing Official Headgear in the Early Ming

张志云

Zhang Zhiyun

内容提要:

明代冕服是帝国历史上最后的“汉式冠冕”，在元末明初的历史情境中，冕服礼制无疑受到了朱元璋集团的重视。通过对明初冕服礼制的议定过程与内容的梳理，可发现朝廷在儒家理想与实用主义之间的某种调和。当冕服成为皇族的独享之物时，君臣之间的区隔与皇族之间的认同同时得到了强化，其规范皇室秩序的功能也越来越显著。所谓洪武二十六年更定冕服之说并不属实，应为误记。

关键词:

明初 朱元璋 冕服 礼制

ABSTRACT:

Ming Dynasty headgear was the final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Han-styled crown. I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Yuan to Ming rule, Zhu Yuanzhang's clique paid enormous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 headgear and dres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and sifting of the process of the various formulations on this matter during the early Ming, the author has discerned how on this matter the court sought a balance between Confucian ideals and pragmatic concerns. When the crown and imperial gown became the sole preserve of the emperor,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the imperial clan were strengthened, and the hierarchical distinctions within the imperial clan were also clearly delineated. The general view that imperial headgear and dress were altered by decree in the 26th year of the Hongwu reign is shown to be erroneous by the author.

KEY WORDS:

early Ming; Zhu Yuanzhang; headgear and dress; system of ritual.

儒家礼制中，冕服礼制是重要一环。《周礼》所载之六冕制度，在东汉时开始影响帝国的礼服制度，此后，冕服制度及其相关礼仪虽历经兴衰变异，但始终是历代王朝不可或缺的象征性符号¹。明代处于帝制晚期，夹在两个“异族”王朝之间，成为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其冕服礼制也成为最后的“汉式冠冕”。站在元末明初的历史情境中，我们也能理解冕服礼制对朱元璋集团的重要意义：在历经“异族”的统治后，作为华夏民族标志性符号的冕服无疑能增强帝国的正统性和民众的认同感，所谓“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等都是同样的诉求，此其一；冕服不仅与帝国的合法性相关联，而且与皇权的神圣性相关联，通过精心安排冕服礼制，能塑造皇帝“承天受命”的神圣形象及规范君臣之间的等级秩序，此其二。所以，冕服作为明帝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朱元璋集团的重视。由此可见，讨论明代冕服制度及相关礼仪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尽管学界对明代特别是明初的诸多礼仪制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²，但论述冕服礼制的似不多见，故笔者愿在此抛砖引玉，以待更深入的讨论。

一

汉魏至唐宋，历代王朝秉承《周礼》“君臣皆有

其冕”的基本精神，无不对冕服礼制精心规划，以统治天下，协和万邦。冕服礼制在形式上，则不断翻新花样，时而是“六冕同制”、“单列式”，时而是“君臣通用”、“多列式”³。然而，当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第一个大一统“异族”王朝后，儒家礼制包括冕制受到了极大的漠视——虽然元代名义上也有冕服，但常常只是空壳，蒙古皇帝并不一定执行。元亡明兴之际，当汉族人又一次夺回中国的统治权时，朱元璋及其儒士集团面对元朝留下的历史遗产，是如何规划冕服制度的呢？

在大明王朝成立的前夜，冕服作为开国大典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相关规划已经展开⁴。吴元年十二月（公元1367）癸丑，李善长率领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朱元璋认为“此大事，当斟酌礼仪而行，不可草草。”⁵表明他对礼仪的尊崇与慎重。随后辛酉日、乙丑日，即位礼仪⁶和册皇太后、皇太子仪⁷分别被提交上来，这些礼仪皆礼曹主事崔亮所条画。按照滨岛敦俊的说法，李善长、崔亮等皆“小吏”出身，属于习惯派⁸，可见，最初的冕制规划是由习惯派主导的。从他们所拟登基仪式中，我们看到的是皇帝、皇太子和诸王身着衮冕，文武群臣簇拥朝拜的景象，而参予其事的臣子没有得到服冕的资格。朱元璋对他们所提交的即位礼仪未发表不同意见，但在册皇太后、皇太子仪上却有一定分歧，他认为：“礼文太繁，况是日即位告祭

1 其基本走向，参见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此文分三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连载，分别为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2006年第2期。

2 详论明代官方礼制之作，可看《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页812—862，第十三章“明代的官方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专论明太祖朝的，可看罗仲辉：《论明初议礼》，王春瑜编：《明史论丛》页74—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滨岛敦俊：《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史学集刊》页7—15，1995年第4期；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见氏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页70—1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阎步克语，参见上引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一文。

4 罗仲辉对从吴元年五月到洪武三年九月这期间的议礼活动有详细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明初礼仪规划的过程，参见上引罗仲辉：《论明

初议礼》一文。

5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上，页0430，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

6 主要礼仪程序包括：告祀天地，即位于南郊，诣太庙并奉上册宝追尊四代考妣，告祀社稷，具衮冕御奉天殿百官上表称贺，遣官册拜皇后、册立皇太子，以即位诏告天下。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上，页0433—0434。

7 主要礼仪程序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下，页0439—0467。

8 滨岛敦俊认为，朱元璋政权并非整齐划一的集团，文臣之间由于信仰、所受教育程度、地域等原因也充满了矛盾，并将他们主要分为习惯派与观念派两派，习惯派以李善长、崔亮等为代表，观念派以陶安、钱用壬等为代表。这一点对本文的分析极具启发性。参见上引滨岛敦俊：《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一文。

天地、宗庙，恐群臣趋事不暇给，其贺中宫与东宫，宜省节之。”¹这段话表明了朱元璋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对礼仪相当尊崇，一方面又抱有一种实用的态度。

洪武元年（公元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行登基大典，开始君临天下。²但国家典制还远未完善，无论是国家大祀，还是冕服体制，都需进一步议定。趁此机会，洪武元年二月戊辰，属于观念派的陶安提出了新的冕制方案：“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庙、社稷、诸神，各有所用，请制之。”³这一方案的理想色彩与复古情结有多浓厚，我们只要稍作历史回顾就能发现——除了《周礼》中天子有所谓“五冕”或“六冕”外，自汉魏至唐宋，历代王朝皇帝鲜有实行其制者。唐初皇帝的冕制或许符合这一标准，但唐高宗时即“鹖冕已下，乘舆更不服之。”⁴陶安显然对习惯派崔亮所拟的冕制方案不太满意，想代而替之。据此，我们还可推论，如果君王实行“五冕”之制，那么，依照华夏冕制的传统，下一步顺理成章的是否就是臣下服冕传统的恢复⁵？可见在当时，冕制存在回归传统的可能。但这一提议并没有被朱元璋采纳，他认为：“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⁶在习惯派与观念派的方案之间，朱元璋显然更倾向习惯派的方案，这决定了明代的冕制规划，只能是在既定的君臣分隔的框架内行动。但这并不能反映随后的冕制规划是由习惯派主导的，滨岛敦俊对洪武三年城隍改制的研究启发

我们，观念派曾在当时处于主导地位，在冕制规划上，可能存在同样情形，下文将进行具体分析。

二

明初冕制规划的初步成果见于洪武三年九月修成的《大明集礼》。虽然朱元璋政权内部存在矛盾与分歧，但《大明集礼》应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可举两条例证说明。前面我们提及朱元璋嫌崔亮所拟册皇太后、皇太子仪繁琐，将其程序与《大明集礼》的规定对照，可发现礼仪并未因此简省，只是有部分修正，使之更符合儒家规范，这其中的改动，可能出自观念派的手笔。如册皇后仪，崔亮等所拟皇后受册毕有皇后会群臣于谨身殿，于中宫会内外命妇之仪⁷，可能基于内外有别的考虑，《大明集礼》改为皇后受册毕皇帝会群臣于谨身殿，皇后于中宫会内外命妇，其仪皆如正至宴会之仪⁸。再者，朱元璋虽拒绝采用“五冕”之制，但衮冕的使用范围也并不限于他所划定的“祭天地、宗庙”的范围，《大明集礼》对衮冕使用范围的精心划分，显然是精通正统儒学的观念派所为。

《大明集礼》继续开国之初的做法，使“冕之有无”成为君臣之间的一道界线。可能尚属草创，《大明集礼》只讨论了有服冕资格的皇室两代人：皇帝以及皇太子和诸王，衮冕形制上的异同，见下[表一]：

1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下，页0467。

2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页0477。

3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页0532。

4 参见上引阎步克的研究，唐高宗时冕制的具体情况特别见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下）——〈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页95，2006年第2期。

5 在明代一部分儒家精英的心中，回归传统冕制的愿望是存在的。如丘浚所言：“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于大夫皆谓之冕，后世惟天子得

谓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数等差尔。后世则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后世，使后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庶几有以为复古之渐。”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八《章服之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页0532—0533。

7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下，页0454。

8 《明集礼》卷十九《嘉礼三·册皇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表一〕皇帝、皇太子、诸王冕服表

构件	皇帝	皇太子	诸王
冕、旒	冕板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里，前后各十二旒，每旒五采玉珠十二，黹纁充耳，玉簪导，朱纁。	九旒，每旒九玉，红丝组纁，金簪导，两玉珥。	冕用五采玉珠，九旒，红丝组为纁，青纁充耳，金簪导。
衣、裳	玄衣、纁裳	玄衣、纁裳	青衣、纁裳
章纹	十二章。衣六章画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裳六章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九章。衣画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	九章。衣画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
中单	以素纱为之	白纱中单，黼领。	白纱中单，黼领，青缘。
蔽膝	红罗蔽膝，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绣龙、火、山三章。	纁色，绣火、山二章。	纁色，绣火、山二章。
革带、大带	革带长三尺三寸；大带素表朱里，两边用缘，上以朱锦下以绿锦。	革带，金钩鞶；大带白表朱里，上缘以红下缘以绿。	革带，金钩鞶；大带表里白罗朱绿缘。
佩、纁	玉佩；大纁六采用黄、白、赤、玄、缥、绿，纯玄质，五百首；小纁三，色同大纁，间施三玉环。	玉佩；大纁五采赤、白、玄、缥、绿，纯赤质，三百二十首；小纁三，色同大纁，间施三玉环。	玉佩；大纁五采赤、白、玄、缥、绿，纯青质，三百二十首；小纁三，色同大纁，间施三玉环。
袜、舄	朱袜、赤舄。	白袜、赤舄。	白袜、朱履。

《大明集礼》“五礼”部分对仪式中衮冕的使用也作了精心规划，基本信息见下〔表二〕：

〔表二〕四礼部分仪制冕服表

吉礼	祀天	皇帝不用传统大裘之制，惟服衮冕，皇太子侍祠服衮冕而执圭。
	祭地	皇帝夏至亲祀服衮冕，皇太子侍祠服衮冕而执圭。
	祭宗庙	皇帝亲享太庙服衮冕，皇太子侍祠服九旒冕衮服九章，亲王祀仁祖庙服衮冕。
	祭社稷	国朝皇帝亲祭服衮冕。
	王国祭社稷	王服冕服。
	祭日月	服衮冕。
	藉田享先农	仲春择吉日行礼，皇帝亲祠躬耕，皇帝、皇太子皆冕服。
嘉礼	朝会	正旦、冬至、圣节朝会，皇帝、皇太子和诸王皆服衮冕。诸王来朝仪：皇帝服皮弁服，诸王具衮冕。
	贺中宫	正旦、冬至、寿诞皇太子、诸王朝贺中宫，皇太子、亲王具冕服，皇后首饰袿衣。诸王来朝仪：亲王具冕服，皇后首饰袿衣。
	册皇后	皇帝临轩服衮冕，皇后受册服用袿衣；次日群臣上表上笺称赞两宫，皇帝服衮冕御奉天殿受贺。
	册皇太子	皇帝临轩服衮冕，皇太子受册冕服九章；皇太子朝谢中宫时具冕服行礼；诸王贺东宫皆便服行礼；诸王贺中宫具冕服行礼；择日恭谒太庙具冕服行谒告礼。
	册亲王	皇帝临轩服衮冕，亲王服远游冠绛纱袍；百官称赞上表笺，皇帝、皇太子和亲王皆服衮冕。
	天子加元服	皇帝于奉天殿行礼，先服空顶帻绛纱袍以出，次加衮冕服；其后谒庙、会群臣皇帝皆服衮冕。
	皇太子加元服	天子自为主设御座于殿庭，设冠席于殿之东壁行礼，皇太子加元服一加折上巾再加远游冠三加衮冕；明日皇太子服衮冕执圭谒庙。
亲王冠礼	天子自为主其陈设仪同皇太子，一加折上巾再加七梁冠三加九旒冕；择日冕服谒庙。	

〔表二续〕

嘉 礼	天子纳后	皇帝临轩遣使皆服衮冕；皇帝着衮冕受群臣贺。
	皇太子纳妃	皇帝服衮冕遣使奉节，皇太子亲迎、醮戒具衮冕服。
	亲王纳妃	皇帝服衮冕于御奉天殿遣使，亲王具衮冕行礼。
宾 礼	蕃王朝贡	皇帝服衮冕，皇太子服冕服，百官具朝服侍立，蕃王服其国服，若尝赐衮服者则以衮服朝见。※
	蕃国望阙行礼	蕃王于正旦、冬至、圣寿率众官行礼，王于后殿具冕服，未赐者服本国之服。
	蕃国进贺表笺	王具冕服及众官各具朝服。
	蕃国接诏	众官具朝服，王具冕服。
军 礼	论功行赏	皇帝、皇太子、诸王皆冕服。
	大将受爵赏谢恩进表	皇帝、皇太子皆冕服。

※此依“蕃王朝贡”条“冠服”的规定，但其与后面“朝见仪注”中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皇太子服皮弁的记载相矛盾，不知何故。据《四库总目提要》考证，此乃嘉靖中刊本，因嘉靖诸臣臣补纂入而多出三卷，故记载有自相矛盾之处。或原因即本于此欤？但无论如何，可见当时有赐蕃王冕服的做法；如果蕃王得赐冕服，在宾礼的某些场合中，应身着冕服，见表中所列。

如果将上述冕服礼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下，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特色：

一是对冕服体系进行了彻底的简化，这种简化从两方面展开：首先是对传统“君臣皆有其冕”的冕服体制进行革新，将冕服的使用仅限于皇室；其次是将传统“六冕之制”简化为“一冕之制”（衮冕）。如此，冕制历史上出现过的“六冕同制”、“单列式”，或“君臣通用”、“多列式”等这些繁复的体系一去不复返，从此，冕服成为皇帝与皇室独占的象征符号。阎步克的研究表明在宋代，作为群臣祭服的冕服日益空壳化，与品官的身阶之间日益疏离¹，明代继续这种趋势，将冕服与臣下的联系完全割断。从此一层面来说，我们赞同阎步克的观点：这是一种实用化、世俗化的走势。

当冕服成为皇帝与皇室独占的象征符号后，它的功能又有扩大的趋势，这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一方面，

可视为冕服制度被简化后带来的相应后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应该视作明朝对华夏冕制的创造性利用，其中最典型的见于“宾礼”中使用冕服。明代以前，据笔者管见所及，尚无赐蕃王冕服的记载，国家礼典中亦不见蕃王服冕的安排。明代赐冕服的做法，早在《大明集礼》编成之前。据《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记载，洪武三年八月辛酉，“高丽遣其三司使姜德赞上表谢赐冕服，贡方物并纳元所授金印。”²可见在此之前，明王朝就已赐朝鲜国王冕服。根据《明史》的记载，当时所赐应该为衮冕九章³。《大明集礼》将这一做法进一步制度化，并推及宾礼的某些仪式中，规定蕃王“若尝赐衮服者”则要衮服行礼。可以推论，如果一个“蕃王”被恩赐冕服，则意味着其“蕃国”不仅被纳入“中国”，不再被视为夷族，而且意味着他被接纳为皇帝“家内”的一个拟制成员，皇帝与国王之间不只是君臣关系，而且具有准父子关系，“蕃

1 参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下）——〈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页97，2006年第2期。

2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页1077。

3 据《明史》记载：“宣德三年，朝鲜国王李陶言：‘洪武中，蒙赐国王冕服九章，陪臣冠服比朝廷递降二等，故陪臣一等，比朝臣第三等，得五梁冠服。’”参见《明史》卷六十七《舆服志三·外蕃冠服》页1655，中华书局，1974年。

王”如同被封分的诸王一样。这可谓明王朝对冕服这一符号的创造性利用，表达了他们对“天下”秩序与皇权观念的理解。任何一个王朝在对外关系中都要区分亲疏，根据周边国家的态势采取行动，行动策略各各不同，明王朝的一个特异之处是使用冕服来区分亲疏。尽管它只是一种策略，可它背后是有一套观念支撑的。纵观洪武朝，被恩赐冕服的只有朝鲜国王，明开国初就赐其冕服，实质是与残存的元朝势力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从当时的态势看，朝鲜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战略地位上考虑，都处于外交的核心地位，是“最亲的”，所以明王朝愿意接纳其为一个“家庭成员”¹。

冕服既在君臣之间划分了界线，也在皇帝与皇室中重新划定了等级，这点非常重要，它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明代皇权观念的某些线索。儒家冕制的基本精神是“君臣皆有其冕”，这点在明代遭到了彻底破坏。以往冕制无论怎样尊君卑臣，但君臣共“冕”、君臣一体的象征含义或多或少总还存在。明代改制，则将这一层象征含义完全抹去，君臣之间，判若鸿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补证了明代君主专制的强化？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冕服礼制所表达的皇太子和诸王之间的等级秩序，很显然，这一秩序不同于唐宋时代。唐宋时代，作为继体之君的皇太子与作为臣下的亲王这层区隔还是比较清晰的，这在宋代服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亲王相比，宋代皇太子在“受册、谒庙、朝会”时独有“远游冠、朱明衣”²；南宋绍兴年间，皇太子的冕服为九旒冕，其他皇子则降为“金涂银八旒冕”³。《大明集礼》中，这一秩序有了变动，亲王

显然不再像唐宋时那样等同于一品之臣，皇太子和诸王之间除了衮冕形制基本相同外，日常朝服皮弁形制亦相同⁴。在正旦、冬至和圣节这样的盛大朝会上，不仅皇帝、皇太子服衮冕，诸王亦服之。在册皇太子的礼仪中，诸王贺东宫之仪，皆便服，行家人之礼。这些礼制规定是否暗示了明代皇权“家天下”观念的强化？

三

在《大明集礼》颁布十三年以后，洪武十六年六月，朝廷又对冕服制度进行了一次调整。这次调整只针对皇帝衮冕，并不涉及皇子冕服。调整的建议首先由礼部提出，“先是礼部言：虞周以来衮冕制度不一，国初所制虽参酌古制，然尚未备，宜加考定以成一代典章。上命诸儒臣参考历代之制，务斟酌得宜。”翰林院诸儒臣将冕服形制议定以后提交给朱元璋，皇帝“从之”⁵。这次皇帝衮冕形制的改动，基本情况见下[表三]：

[表三] 皇帝衮冕表

基本构件	皇帝衮冕
冕、旒	冕，前圆后方，玄表纁里。前后各十二旒，每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纁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红丝组为纓，黹纁充耳，玉簪。
衣、裳	玄衣、黄裳
章纹	十二章。衣六章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裳六章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中单	白罗中单，黻领，青缘襖。
蔽膝	蔽膝随裳色，绣龙、火、山，龙文。
革带、大带	玉革带，白罗大带，红里。

1 关于明帝国与朝鲜的关系，可参见《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第五章《明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元末明初朝鲜在蒙古人和明朝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具体见于此书页246—249。

2 《宋史》卷一百五十一《輿服三》页3533—3534，中华书局，1977年。

3 《宋史》卷一百五十一《輿服三》页3534，中华书局，1977年。

4 《明集礼》规定皇太子与诸王“其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他们的礼仪规格是相同的，参见《明集礼》卷三十九《冠服》。

5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五，页2420。

〔表三续〕

基本构件	皇帝衮冕
佩、绶	玉佩；大绶六采用黄、白、赤、黑、缥、绿；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
袜、舄	黄袜，黄舄，金饰。

改动主要有三点：将皇帝之冕设计得更加精致；将纁裳改为黄裳；将朱袜赤舄改作黄袜黄舄，并加金饰。

此次单方面调整皇帝衮冕形制，明显加大了皇帝与皇子之间的区隔，突出了天子至尊无上的地位，背后流露出“尊尊”原则的考量。从儒臣的角度看，衮冕改制反映了他们复古的热情。东汉以来，玄衣纁裳可谓是衮冕的通制（也有例外），洪武初年沿袭之。但上古三代的衮冕是玄衣黄裳的，如《后汉书·輿服志》下所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¹此次对皇帝衮冕的调整由儒臣发动，将玄衣纁裳改作玄衣黄裳，是发思古之幽情的体现。从中也可推测儒臣对朱元璋抱有某种“圣君”的期望。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朱元璋授意规划亲王世子的冕服，礼部议定其形制与使用场合如下：

冕服各七章，冕纁七就，前后各七旒，旒七玉纁，玉皆朱、白、苍三采。衣青质，以火、宗彝、华虫为文。裳纁色，藻、米、黼、黻为文，佩用白玉，而玄组绶，用紫质，紫黄赤为采，双白玉环，舄鞞皆赤色，素中单，青领襍，圭长七寸阔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凡遇天寿、圣节、皇太子千秋节，并正旦、冬至、进贺、表笺、告天、祝寿，世子冕服，随班行礼²。

此次议定冕服意在完善《大明集礼》冕服礼制的规定，朝廷需要利用冕服来进一步规范皇族内部秩序：有资格服冕者，从皇帝/皇子延伸至第三代亲王世子，形成皇帝/皇太子、亲王/王世子三个等级序列：

〔表四〕皇帝、太子、亲王、世子冕服等级表

	冕旒	衣裳	章纹	袜舄
皇帝	十二旒	玄衣黄裳	十二章	黄袜黄舄
皇太子	九旒	玄衣纁裳	九章	白袜赤舄
亲王	九旒	青衣纁裳	九章	白袜朱履
王世子	七旒	青衣纁裳	七章	赤袜赤舄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朝廷对开国以来的冠服制度作了一次大调整，但这次调整基本上不涉及冕制，“皇帝、皇太子、亲王冕服仍旧制，但章服画衣绣裳蔽膝，皆易以织文”；“世子冠服则衮冕七章，青纁充耳，金簪导。圭易以九寸”³。

又据《明史·輿服志》，洪武二十六年朝廷对冠服制度有一次系统更定，其中也涉及皇帝、皇太子、亲王和亲王世子冕服。然而，对于洪武二十六年更定冕制之说，我们认为有些疑点，在此略加辨正。将《明史·輿服志》所载此年皇帝、皇太子、亲王冕服形制与洪武元年《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礼》所载形制相比较（洪武元年、洪武三年的冕制是同一个系统），可发现它们之间基本无差别；至于亲王世子冕服，洪武二十四年所定已如此，这是疑点一。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可谓是对明初以来冠服制度的一次总结，相距不到两年，朝廷再次对冠服制度进行系统更定，似乎无此必要，这是疑点二。《明史·輿服志》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之说，大抵本于《万历会典》（续修四库本），而《正德会典》（四库本）则不载，《正德会典》对如此重大的事件

1 《后汉书》卷一百二十《輿服志下》页3661，中华书局，1962年。

2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七，页2960。

3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九，页3111。

不作记载，似乎没有道理。此外，洪武二十六年《实录》下亦无相关记载。再如，明黄佐《翰林记》卷七对明初以来冠服制度的损益均有记述，其中提及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冠服、居室制度¹，但并未提及洪武二十六年更定冠服之事，乃又一例证也。学界以前也有人《明史·舆服志》相关记载提出质疑，如黄云眉《明史考证》指出洪武二十六年皇太子衮冕形制与洪武元年相同，“谓洪武二十六年定，但据洪武元年十一月《实录》，则皇太子衮冕之制，元年所定已如此。”²黄先生对此只是点到为止，未尝深究，他的看法亦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一般谈及冕服、冠服，就径引《明史·舆服志》，不曾发现其中的错误。其实，洪武二十六年更定冠服制度的记载总体上看是否属于误记，尚待进一步探讨。

以上我们对明初冕服礼制的议定过程及其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虽然朱元璋强调华夷之辨，以“复汉官之威仪”为号召，但从冕服议定来看，他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并不打算真正恢复传统儒家的冕服礼制，这与他身边的部分儒士之间存在分歧。另一方面，冕服礼制在明初呈现出一种精细化的趋势，而且还不乏创新，这又体现了儒士助手对朱元璋施加了有效影响。当冕服成为皇族的独享之物时，君臣之间的区隔与皇族之间的认同无疑会同时得到强化，其规范皇室秩序的功能也越来越显著。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赵中男)

1 黄佐：《翰林记》卷七《定制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黄云眉：《明史考证》页467，中华书局，1980年。